

唐代长安藏库新考^{*}

郭桂坤

内容提要:唐代长安藏库体系发生过两次重大变化。大明宫建成之前,长安之左、右藏库并立于太极宫东宫的广运门内。大明宫建成以后,原有左、右藏库旧址偏南之处,即恭礼门东、长乐门内,新建了左藏东库;以太极宫中轴线为对称轴而与其对称的位置,即安仁门西、永安门内建了左藏西库,贮存“四方所献金玉、珠贝、玩好之物”的右藏库则转移到了大明宫。其中,右藏内库在大明宫宫城之内近于所谓“内侍别省”的某处,右藏外库则在宫城之外后来被考古工作者称为“西夹城”的范围之内。在内侍省内府局所统中宫藏库膨胀为庞大内库体系的过程中,前者演化为了大盈、琼林等库,后者则演化为口味等库。被内库吞并的右藏库,此后则一直未得恢复。

关键词:唐代 长安 藏库 内库

长安藏库是唐王朝财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了其内部结构并勾画其演变轨迹,构成了唐代财政史上一个基础性问题。就各库位置及其对应关系的判定而言,自清代徐松以来,已经多有讨论。但由于史料记载过于零碎分散,且藏库前所冠之“左”“右”二字,极易混淆,故各家虽迭有新见,迄今却仍未有定论。本文尝试检讨前贤旧说,尽可能明了其各自问题所在,并对唐代长安藏库的分布及其流变给予新考,以就正于方家。

—

徐松在《唐两京城坊考》中考述:太极宫“承天门东长乐门,长乐门内东左藏库。承天门西广运门,广运门内有西左藏库。”^①其中,徐松所谓广运门的位置,应该是永安门,辛德勇对此已有详细辨析。^②当然,名称的错位并不影响徐松对于藏库坐标的认定。从其注文的引述和判断来看,他的认识与胡三省一致,后者即认为《雍录》所附《唐西内太极宫图》表明“太极宫中东左藏库,西左藏库;东库在恭礼门之东,西库在安仁门之西”。^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57年3月至1959年5月,对大明宫遗址进行了勘察与发掘。根据西夹城内出土的大量而集中的封泥这一点,考古工作者怀疑此处很可能是一处“藏库”所在。^④不过,当时做出这一推测,是与宫城通夹城之门当为九仙门这一推断密切相关的。然而,1959—1960年在对大明宫北部继续进行勘探发掘时,考古工作者却探得“右银台门以北750米处,距宫城的西北角245米”的一座门址。它既符合“有关大明宫的各图所记”,又符合“文献所记”的九仙门,自当是九仙门遗址无疑。可是,文献记载中大明宫西城墙应当只有右银台门与九仙门,撰写这一阶段发掘简报

[作者简介] 郭桂坤,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上海,200433,邮箱:guogukun751@163.com。

*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10批特别资助项目“唐代中央政务文书运作体制演进研究”(批准号:2017T100262)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清]徐松撰、张穆校补:《唐两京城坊考》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页。

② 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93—102页。

③ [宋]程大昌撰、黄永年点校:《雍录》卷3,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0页;《资治通鉴》卷216,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893页。

④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唐长安大明宫》,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7页。

的马得志对连通宫城与夹城之门的解释是：“此门距右银台门很近，却仅是从宫内通往夹城，其东面紧邻所谓翰林院遗址，据此来看，或即为《雍录》等书所谓的翰林院之胡门（或复门）也未可知。此门是开在城墙处，如是胡门（或复门）则学士院似在西夹城之内。这与《雍录》卷4复门条引石林所谓的‘学士院在禁中，非内臣宣召无因得入，故院设复门所以通禁庭也’之说相符。”^①也就是说，因为该门推断意见的变动，藏库开始被学士院等其他机构排挤出西夹城了。在1980年以后对西夹城进行调查发掘的过程中，马先生又根据文献记载与所发掘遗址布局的一致性，进一步认定西夹城内为翰林院遗址，其右侧通宫城的门址为文献中的“翰林门”。^②如此一来，过去《唐长安大明宫》中提出的西夹城当是藏库所在的说法也就遭到了摒弃。此后，考古工作者一直接受这种看法。近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第一工作队绘制的《2007—2011年唐大明宫遗址考古平面图》亦将西夹城内的建筑遗址标注为“翰林院”，右银台门北侧的门址标注为“翰林门”。^③

但是，以上判断是与《阁本大明宫图》等传世文献相矛盾的。对此，辛德勇根据传世文献，结合相对位置关系与内部平面布局形态两个方面，条分缕析地否定了西夹城内建筑遗址为翰林院的观点，推测其可能性有三，即内侍省或内侍别省、右藏库、掖庭宫。^④辛先生的否定理由已经足够充分，但推测的3种可能性还有值得继续探讨之处。据《阁本大明宫图》及其他文献所载，大明宫的内侍省或内侍别省在右银台门内，不在西夹城的位置；又，大明宫中的掖庭宫从未见诸于记载，宫人应当是居止于禁中的“野狐落”。^⑤所以，杜文玉援此两条理由，根据西夹城出土大量封泥、封闭性甚佳、门道较宽等条件，认为“西夹城内应是右藏库之所在”，并且进一步推测这很可能是与太极宫安仁门内的右藏内库相对应的右藏外库。^⑥杜先生推断西夹城为右藏外库之所在的思路是正确的，但他对藏库的对应关系理解有误，也没有留意其历史变化，因此其结论同样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二

唐人李庾《西都赋》有云：“西则月华重启，银台内向，中书在焉，密用宰相，宦者别省，廷缘右藏”。^⑦根据其先“内”后“外”的谋篇布局，可知这里的“右藏”应该处于大明宫内。同样地，《阁本大明宫图》所绘制的“左藏库”（据《长安志》，当正为“右藏库”）亦在大明宫宫墙之内，不在宫墙之外西夹城的位置。^⑧而西夹城南部之北端出土大量封泥这一事实表明，这里确实最有可能是一处藏库遗址。根据李锦绣的研究，封泥集中出土之地很可能是中晚唐口味库之所在。^⑨而直接反映中晚唐情况的史料中，除了这个所谓的口味库之外，应当还有琼林、大盈等库。它们均由宦官把控，所以也就出现了一系列宦官充任的口味库使、琼林库使、大盈库使。^⑩包括左藏库在内，在中晚唐都曾出现过由殿中侍御史一人充“监左藏库使”兼理，^⑪但我们找不出一个“右藏库使”之类的名头，或是作为确

^① 程大昌：《雍录》卷4，第78页；马得志：《1959—1960年唐大明宫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7期。

^② 马得志：《西安市唐大明宫翰林院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35—236页；马得志：《唐长安城发掘新收获》，《考古》1987年第4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第一工作队：《西安市唐大明宫遗址考古新收获》，《考古》2012年第11期。

^④ 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第138页。

^⑤ 参见程大昌《雍录》卷3，第48页。另《长安志》卷6“野狐落”条注文载：“太和二年十一月甲辰，禁中火灾，从昭德寺起，延烧宣政殿东，午门亦炽，宫垣半为灰烬。寺之南，禁中呼为野狐落。宫人居此者，为火所逐，攀援墙垣以出。出不及者，焚死数百人。”参见[宋]宋敏求撰，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卷6，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2页。

^⑥ 杜文玉：《唐长安大明宫建筑丛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3期。

^⑦ [唐]李庾：《西都赋》，[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44，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196页。

^⑧ 程大昌：《雍录》卷3，第48页；宋敏求：《长安志》卷6，第241页。

^⑨ 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28页。

^⑩ 相关史料可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第452—454、927—928页。

^⑪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60，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054页；《新唐书》卷48《百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40页。

称的“右藏库”。因此李庾《西都赋》中所用“右藏”，可能为旧名。也就是说，中晚唐右藏库可能已经分化为口味、琼林、大盈等库。它们的分布，有在大明宫内者，如琼林库和大盈库；也有在大明宫外者，如口味库。在大明宫之内者，所承即为“右藏内库”；在大明宫之外者，所承即为“右藏外库”。

做出如上推断的理由，在于《唐六典》卷20“太府寺”条所载：“太府寺管木契七十支：十支与左藏东库合，十支与左藏西库合，十支与右藏内库合，十支与右藏外库合，又十支与东都左藏库合，十支与东都右藏库合，各九雄、一雌。九雄，太府主簿掌。又，五支与左藏朝堂库合，五支与东都左藏朝堂库合，各四雄、一雌。”^①这段史料足以说明，在开元时左藏曾分为东、西及朝堂三库，右藏分内、外两库。右藏内、外库之区分，当以大明宫宫墙为限。^②出土《唐重修内侍省碑》载光化二年（899）重修之前的内侍省状况，已有“内则内园、客省、尚食、飞龙、弓箭、染坊、武德留后、大盈、琼林、如京、营幕等司，并命妇院，高品、内养两院”的陈述，^③透露自右藏内库旧址演生出的大盈、琼林两库，后来应该处于内侍省之“内”。史料又一致记载，大明宫内侍省在右银台门内近门的某处。如此，则大盈、琼林两库也应该在大明宫内靠近右银台门的位置。^④可资补证的一点是，前述碑文提及染坊也在内侍省中，说明它同样应该在右银台门内某处，故经常有染工通过右银台门前往大明宫内的染坊，以致敬宗时染坊工人张韶得以纠集染工及无赖百余人，假借输材，闯入大明宫作乱。^⑤

关于左藏库，史料记载亦颇多分歧。辛德勇认为左藏库不分东、西，杜文玉则据前引《唐六典》及相关史料予以辨正。^⑥不过，辛先生认为太极宫的东宫广运门内有左藏库，在安仁门内则有一右藏库与之相对，这种见解也同样值得斟酌。杜先生却没有注意到其中的问题，反而由此出发，认为大明宫也存在对应的左藏库与右藏库，并将大明宫的左藏库称为左藏东库，太极宫内的左藏库称为左藏西库。跨宫而称东、西，别内、外，不合常理。而且如前所辨，大明宫实际上只有右藏库，而无左藏库。与大明宫右藏库相对的，正是处在太极宫内的左藏库。左藏东库在恭礼门东、长乐门内，左藏西库在安仁门西、永安门内。至于太极宫内的右藏库，应该是在左藏分东、西两库以前存在过。《长安志》卷6“广运门”条注文载：“内有左藏库，次北有旧右藏库，后有弘文馆，西北有武库。”^⑦这里的“旧”，我们认为就是指大明宫建成以前，太极宫的东宫广运门内有左、右藏库并立，这样恰好可与《大业杂记》所载隋东都左、右藏库俱在东宫泰和门内进行参证。^⑧

随着唐朝国力的强盛，无论是国家租赋，抑或是地方进贡，数量均越来越大，故库藏也开始扩充。大明宫建成以后，皇权中心随即转移，存放“邦国宝货”并逐渐朝天子私库演变的右藏库也就转移到了大明宫。^⑨在左、右藏库旧址附近偏南之处，新建了左藏东库，又在其对称的位置（以太极宫中轴线为对称轴）建了左藏西库。为“会赐及别敕赐赉六品已下，即于朝堂给之”之便，至晚于开元年间又在安仁门（崇义门）内建立了朝堂库。^⑩由于左、右藏库各有专职，一储“诸州庸、调及折租等物”，一贮

^①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20，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42页。

^② 《长安志》卷7（第251页）载：太仆“寺东安上门街。街东第一少府监。次东左藏外库院。”按：这个左藏外库院既在太极宫宫城之外，可作为判断右藏外库当在大明宫宫城之外的一条辅证。

^③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1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④ 尚民杰、程林泉认为就现有资料而言，大盈库在大明宫的可能性较大，琼林库的位置尚无明确线索，参见《唐大盈库与琼林库》，《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6期。李锦绣推断大盈、琼林库位置三种可能性的第一种即为右银台门附近，参见《唐代财政史稿》（下），第440页。

^⑤ 《资治通鉴》卷243，第7836—7837页。

^⑥ 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第112—116页；杜文玉：《唐长安大明宫建筑丛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3期。

^⑦ 宋敏求：《长安志》卷6，第232页。

^⑧ [唐]杜宝撰，辛德勇辑校：《大业杂记辑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⑨ 葛承雍认为左右藏库址是变化的，唐高宗龙朔后，历代皇帝居位于大明宫，因此库藏也随着政治中心迁移到大明宫，参见其所著《唐代国库制度》，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87页。

^⑩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20，第542页。关于左藏朝堂库的位置，李锦绣引用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的说法，认为在大明宫内，参见《唐代财政史稿》（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58页。实际上，徐松是沿袭了《阁本大明宫图》的舛讹而已，具体辨析参见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第138—139页。

“杂送物”，即所谓“四方所献金玉、珠贝、玩好之物”。^① 朝堂库尽管位处太极宫右侧，但所存既为前者，自然当属左藏。这就是为何《永乐大典》转绘《阁本太极宫图》及明吴琯刻《古今逸史》本《雍录》所载《阁本太极宫图》分别在安仁门（崇义门）之西或西偏北的位置标注“左藏库”的缘由。^②

三

前文提及中晚唐右藏库很可能已经分化为大盈、琼林、口味等库，但主要是就位置关系而言。实际上，从官僚职司等角度来讲，大盈、琼林、口味等库是从内侍省内府局所掌中宫藏库发展而来。^③ 此前，关于中晚唐史料中“右藏库”销声匿迹的原因，已经有学者从其与他库合并的角度加以解释。葛承雍提出了两种可能性：其一，右藏与内府局宦官管理的中藏合并为一个机构，共称“内库”；其二，右藏在安史之乱后被撤销而合入左藏。^④ 吴志宏认为葛先生提出的两种可能性并不矛盾，并给出了一个调和性的解决方案：右藏内库被内藏合并；右藏外库则被左藏合并。^⑤ 两位先生推测右藏并入左藏所用关键史料基本一致，但笔者认为它们尚有甄别的必要。

其一，《唐语林》载：开元初，“置开远门，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满右藏；东纳河北诸道租庸，充满左藏。财宝山积，不可胜计。”^⑥ 葛先生认为这段史料反映左藏征纳长安以东地区赋税，右藏则征纳长安以西范围赋税，但两者性质与职能却变为一致。^⑦ 李锦绣则推测这种以长安为中心，分纳东、西方赋税之库，可能分别是左藏之东、西库。^⑧ 其实，这段史料并不能反映唐代库藏的职能分工情况。首先是因为它与现存有关唐前期左、右藏职能分工的史料全部不符。其次，这段文字很可能本于《开天传信记》，然其原文为：“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⑨ 后者不仅文意更通畅，也与唐制并无违碍。可见，《唐语林》的这段记载，为后人引用时加以肆意发挥而成，不能用于作为探讨唐代库藏职能分工的史料依据。

其二，《顺宗即位赦》中有一段内容为：“常贡外不得别进钱物，金银器皿、奇文异锦、雕文刻镂之类。若民已发在路，并纳左藏库。”^⑩ 另有人论及敬宗宝历二年（826）七月户部侍郎崔元略进准宣索左藏见在金银时云：“旧制，户部所管金银器，悉贮于左藏。”^⑪ 葛承雍认为这都是将右藏贮存物品归于左藏的典型事例。^⑫ 吴志宏也认为这体现了本属右藏的职能为左藏所代行。^⑬ 就宝历二年的这条史料而言，其中的“金银器”之所以强调属于“户部所管”，正因为它们应该是从赋税中取得的轻货。^⑭ 而正额赋税收归左藏，是整个唐代较为稳定的一贯政策。此时提及“旧制”的原因，在于皇帝为便赐与，要打破常规，将左藏所贮存的作为赋税的银铤及银器 10 万两、金器 7 000 两“尽输内藏”。《顺宗

^①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 20，第 542、546 页。

^② 民国二十四年（1935）宋联奎校印《关中丛书》时，曾从傅增湘处借抄明嘉靖十一年（1532）李经刻《雍录》付印，其所载《阁本太极宫图》，安仁门内“左藏库”作“右藏库”，这应该是出于宋联奎等人的臆改。此处所述几种《阁本太极宫图》的关系，参见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第 115—116 页。

^③ 关于中宫藏库，《唐六典》卷 12（第 361 页）叙及时仅提“中宫藏……”，《旧唐书》卷 44《职官三》（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872 页）和《旧唐书》卷 184《宦官传》（第 4753 页）则明确称其为“中藏”。

^④ 葛承雍：《唐代国库制度》，第 91 页。

^⑤ 吴志宏《唐代中央财库制とその変容》早稻田大学博士学位論文，2015 年，15—20 页。

^⑥ [宋]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卷 3，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309 页。

^⑦ 葛承雍：《唐代国库制度》，第 91 页。

^⑧ 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第 158 页。

^⑨ [宋]郑綮：《开天传信记》，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0 页。

^⑩ [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 2，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10 页。

^⑪ 《册府元龟》卷 484《邦计部·经费》，北京：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5790 页。

^⑫ 葛承雍：《唐代国库制度》，第 91 页。

^⑬ 吴志宏《唐代中央财库制とその変容》，17 页。

^⑭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9 年版，第 82 页。

即位赦文》中之所以要求常贡外不得别进钱物，其实也正是想革德宗后期“进奉”之弊。进奉之物，乃进于宦官所掌内库。^①顺宗要求“若民已发在路，并纳左藏库”，就是为将它们划归国库，作为国家财富。因旧时专贮“金银器皿、奇文异锦、雕文刻镂之类”的国库右藏库已不存，才将其“纳左藏库”。因此，这两则史料似恰可以作为右藏库已为内库所吞并的证据。

《唐六典》载内府局职掌，谓：“内府令掌宫中藏宝货，给纳名数，丞为之贰。凡朝会五品已上，赐绢及杂彩、金银器于殿庭者，并供之。诸将有功并蕃酋辞还，赐亦如之。”^②《旧唐书·食货志》又载：“又王鉉进计，奋身自为户口色役使，征剥财货，每岁进钱百亿，宝货称是。云非正额租庸，便入百宝大盈库，以供人主宴私赏赐之用。”^③从收存的内容（“宝货”）、功用（“供人主赏赐”）以及主掌者（“内侍宦官”）等方面，都可以很明显看出大盈等库对中宫藏库的继承和发展。

陆贽在《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中云：“今之琼林、大盈，自古悉无其制，传诸耆旧之说，皆云创自开元。贵臣贪权，饰巧求媚，乃言：‘郡邑贡赋所用，盍各区分。税赋当委之有司，以给经用；贡献宜归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悦之，新是二库，荡心侈欲，萌柢于兹。”^④左、右藏隶属于太府，自属“有司”。因此所谓的“贡献归乎天子”，实际就是将本应贮于右藏库的“四方所献金玉珠贝玩好之物”划归内库，便于皇帝赏赐“私求”。《旧唐书·王鉉传》所述玄宗充实内库的动机也可证实此点，其谓：“玄宗在位多载，妃御承恩多赏赐，不欲频于左右藏取之。鉉探旨意，岁进钱宝百万，便贮于内库，以恣主恩赐赉。”^⑤这里所谓“内库”，自然就是内府宦官所掌宫内藏库。尽管陆贽等人对这种划归持抨击态度，但不能不注意到其合理性。因为右藏所贮的“四方所献”，^⑥在右藏署并不具有市场交易职能的情况下，只能是用于皇帝支配。那么，从贮存内容及其限定的出给功能角度讲，右藏库与内库几乎是重叠的。在皇帝扩张帝室财政的背景下，后者吞并前者就显得顺理成章了。^⑦

不过，关于这种吞并发生的具体时间，现在已不可考。李商隐《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云：“因令右藏库，摧毁惟空垣。如人当一身，有左无右边。”^⑧如其所述，则右藏库是被摧毁于安史之乱中。但我们认为在此之前，右藏库很可能即使“名存”，亦已经“实亡”了。《旧唐书·崔光远传》载安史之乱中的情形，谓：“驾发，百姓乱入宫禁，取左藏大盈库物，既而焚之，自旦及午，火势渐盛，亦有乘驴上紫宸、兴庆殿者。”^⑨其中，大盈库已经取代右藏库，开始被用于与左藏库等量齐观。前引陆贽《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引耆旧之说谓大盈库创自开元，而《唐六典》的记载方式显示右藏库应该一直存续到开元末。因此，如果认为右藏库是直接为大盈等库替换掉，则时间最有可能是在开元末期。

《新唐书》有两处史料似乎显示天宝后右藏库仍旧存在并且发挥功用，这里稍加辨析。《新唐书·食货志》概括唐转运发展历程时，谓：“刘晏自天宝末掌出纳，监岁运，知左右藏，主财谷三十余年矣。”^⑩核诸两《唐书·刘晏传》，绝无刘晏知右藏的痕迹。其所主“财谷”，应仅及左藏库，这或许是纂史之人想当然的笼统说法而已。该志接下来的一处记载恰好可以证实此种推测，“大历元年（766）敛

^① 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第1029页。

^②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12，第361页。

^③ 《旧唐书》卷48《食货志》，第2086页。

^④ [唐]陆贽撰，王素点校：《陆贽集》卷14《奏草四》，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20页。

^⑤ 《旧唐书》卷105《王鉉传》，第3229页。

^⑥ 所贮物品的详目，参见李林甫等《唐六典》卷12，第545—546页。

^⑦ 唐后期内库的收入绝不仅仅限于“四方所献金玉珠贝玩好之物”，更多的是通过进奉、宣索乃至于宫市敛财等渠道得来。而支出也不仅仅是用于皇帝赏赐，还包括资助度支、户部用于国计，当然最主要的是用于皇帝和宦官的奢侈享受。关于唐后期内库的收支情况，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第919—1082页；关于唐后期内廷的市场行为，参见宁欣《内廷与市场：对唐朝“宫市”的重新审视》，《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

^⑧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5页。

^⑨ 《旧唐书》卷111《崔光远传》，第3318页。

^⑩ 《新唐书》卷53《食货三》，第1369页。

天下青苗钱,得钱四百九十万缗,输大盈库,封太府左右藏,鏹而不发者累岁。”^①据《旧唐书·代宗本纪》所载永泰二年(766)十一月诏,这些青苗钱应该“送上都纳青苗钱库”,^②看来这里所谓的“青苗钱库”实际就是大盈库。不过需要注意的一个事实是,这里的青苗钱本质上应该归于“诸州庸调及折租之物”,而非“四方所献金玉珠贝玩好之物”,所以按理当输左藏库而非右藏库,故这里并提“左右藏”同样只是笼统提及太府所领库藏,并非确指左、右两藏库。

因此,我们认为唐代长安藏库“有左无右边”的局面自安史乱后一直持续到唐末。五代宋初,国库构成仍只有左藏而无右藏。直到宋太宗淳化三年,“分置左、右藏”,^③右藏库之名目才得到恢复。右藏库在如此长的时段内一直缺失的直接原因,如前文所讲应该是其贮存内容和出给功用已经为内库涵括,没有存在的必要。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皇帝扩张帝室财政的需要。只要这种需要一直持续,唐代前期贮存“四方所献金玉、珠贝、玩好之物”供给皇帝个人且作为国库存在的“右藏库”,就不可能再次从内库中独立出来。因此,宋太宗时期仅仅复置了1年的右藏库,本质上不过是从左藏库中分离出来的“左藏右库”,用于与“左藏左库”分掌金银钱帛而已,并非唐代意义上的“右藏”。

综上,在大明宫建成之前,唐长安之左、右藏库并立于太极宫的东宫广运门内。在大明宫建成以后,在原来左、右藏库旧址附近偏南之处,亦即恭礼门东、长乐门内,新建了左藏东库。又在以太极宫中轴线为对称轴而与其对称的位置,亦即安仁门西、永安门内建了左藏西库。贮存“四方所献金玉、珠贝、玩好之物”的右藏库随即转移到大明宫。其中,右藏内库在大明宫宫城之内近于所谓“内侍别省”的某处,右藏外库则在宫城之外后来被考古工作者称为“西夹城”的范围之内。在内侍省内府局所统中官藏库膨胀为庞大内库体系的过程中,前者演化为了大盈、琼林等库,后者则演化为口味等库。被内库吞并的右藏库,此后则一直未得恢复。

A New Study on Cangku in Tang Chang'an

Guo Guikun

Abstract: There were two major changes in the Cangku system in Tang Chang'an.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the Daming Palace, the Zuocangku and the Youcangku were built in the Guangyun Gate of the Taiji Palace. After the Daming Palace was built, In the south side of original location of the Zuocangku and the Youcangku, that was inside the Changle Gate and east of the Gongli Gate, Zuocangdongku had been built. And in the place of symmetry that is inside the Yongan Gate and west of the Anren Gate, Zuocangxiku had been built. The Youcangku was built in the Daming Palace meanwhile. The Youcangneiku was built near the Neishisheng in the Daming Palace. The Youcangwaiku was built at a place be called ‘Xijiacheng’ by archaeologists outside the Daming Palace. In the process of Zhongcangku controlled by the Neifuju of the Neishisheng expanding into a huge Neiku system, the latter turned into Kouweiku and the former became the Dayingku and Qionglinku and so on. After that, the Youcangku had never been rebuilt.

Key Words: Tang Dynasty; Chang'an; Cangku; Neiku

(责任编辑:丰若非)

① 《新唐书》卷55《食货五》,第1400页。

② 《旧唐书》卷11《代宗本纪》,第284页。

③ [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736页。